



2026年10月21日
星期三

第 2467 期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主管主办 网址: http://www.studytimes.cn
报名题字: 江泽民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11-0137 代号: 1-267

新质生产力的质态、业态和创新生态

□ 洪银兴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高质量发展需要新的生产力理论来指导,而新质生产力已经在实践中形成并展示出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支撑力,需要我们从理论上进行总结、概括,用以指导新的发展实践。”在新质生产力科学命题提出3年后,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这是基于新质生产力理论创新成果及实践经验,对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行动作出科学的指导和规范。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义在于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涉及新科技—新质态—新业态的转化。现实中需要基于这三个方面的转化,构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创新生态。

新质生产力的科技“质态”

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在研究新质生产力质态时,需要准确判断各种创新要素的跃升和优化组合对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所起的作用。新质生产力的特点是创新。创新概念最早由熊彼特提出。他认为,创新是一个“创造性破坏”的过程,即新技术、新产品或新的组织形式在取代旧有技术和产业格局的同时,也创造出新的产业与经济结构。新质生产力体现的生产力质态的跃升突出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劳动者要素质态的跃升。过去人们一般把生产力三要素定义为劳动、劳动资料、劳动对象。新质生产力就是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在这里把劳动改为劳动者,是因为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一般的劳动过程,而是创新过程。在创新过程中更为重要的是劳动者,而不是劳动。发展新质生产力对劳动者有质态提升的

要求:提供知识、技术和管理要素的复杂劳动者对发展新质生产力起决定性作用。人才成为创新的第一要素。在数字经济条件下,直接劳动内容发生了质的变化,表现为劳动者利用各类互联网平台采集的数据及数字和智能设备,按一定的算法处理数据,形成新的作为生产要素的数据。创新较一般的劳动更为复杂,也更有价值。就人工智能来说,作为新一代通用性技术,正在广泛渗透进数智化生产交换过程,并且革新产业体系,成为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既然是通用性技术,就需要各类复杂劳动者学习和掌握通用性知识。通用性技术用于专业性领域也需要与专业性领域的技术需求匹配。就简单劳动者来说,简单劳动是不需要经过教育培训就能从事的劳动。但在数智经济时代,简单劳动者不是不需要培训的,而是说教育和培训程度相对较低的劳动者,其技能也需要经过教育和培训升级。在机器大工业时代,简单劳动者主要是服侍机器;在数字经济和智能经济时代,则有一部分劳动者要驾驭机器人、无人机之类的现代工具和系统。这就印证了马克思当时的判断,“大工业的本性决定了劳动的变换、职能的更动和工人的全面流动性”。

第二,劳动资料质态的跃升。生产资料包括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其中,劳动资料是每个经济时代生产力水平的测量器。每个时代的新质生产力体现在劳动资料的突破性改进及广泛应用上。机器大工业时代的劳动资料主要涉及机器设备。当前的数智时代对劳动资料的创造性破坏,就是工业文明时代的劳动资料被数字化平台和智能化系统所代替。伴随人工智能和大模型等数字技术的发展,智能手机、互联网平台、云计算、无人机、智能传感器、自动装配线、工业机器人等成为新型劳动资料。提供这些新生产方式和劳动资料的产业也成为新质生产力的载体。依托人工智能的劳动资料具有人不能及的自动学习功能。现阶段,是否使用数字化平台和

智能化系统以及这些平台和系统的先进水平,就能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产业和企业创新能力。

劳动对象通常是指在劳动过程中被加工、改造的物质资料,包括能源、原材料和土地等自然资源。在当前的新质生产力中劳动对象的创造性破坏突出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绿色生产力对劳动对象的创造性破坏;另一方面是数字生产力对劳动对象的创造性破坏。进入数智时代,数据成为关键生产要素,在许多生产场景中数据收集、处理就成为劳动对象。与其他物质的劳动对象不同,在许多创新场景中强大的算力和科学的算法采集处理数据形成作为先进生产要素的数据及其产品。数据要成为特定生产和创新过程的要素就需要作为劳动对象进行处理和加工。

第三,“数智经济+绿色经济”成为当前新质生产力的综合质态。美国学者杰里米·里夫金在《第三次工业革命:新经济模式如何改变世界》中把第三次工业革命定义为互联网技术和可再生能源的结合。可以从数智经济和绿色经济两方面来把握新质生产力的综合质态。

一方面,数智经济是数字经济和智能经济的结合。当前阶段的新质生产力新科技、新能源、新产业都离不开数字经济。数字经济之所以成为新质生产力的代表性质态,主要是因为其包含了全新的三个要素:一是数据成为关键的生产要素,二是算力成为继热力、电力、网力以后的新动力,三是算法成为现代科技的新方法。这三个方面赋能各个产业产生新质生产力效应。数据越充分准确,算力越强;算法越先进,数字技术越尖端;数字平台规模越大,应用越广泛,数

字经济的新质生产力作用就越大。当前,数字经济的新质生产力作用还有很大的发挥空间,无论是数字产业化,还是产业数字化,都既有现代的技术应用,又有新一代前沿技术探索,所以发展数字经济有迭代升级的要求:人工智能是数字经济的新阶段,是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相应的智能经济成为新经济形态。

另一方面,绿色生产力是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方面。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建立在绿色发展基础之上。绿色生产力既涉及新能源及其带来的能源革命,也涉及绿色技术产生的生态效益,以及可再生材料的发展和利用。从能源角度看,尽管化石能源至今仍然是各个产业的能源基础,但已经具有明显的不可持续性。绿色生产力涉及新能源及其带来的能源革命,新能源革命不仅是发现和开发新能源,还涉及新能源的应用,这是能源革命的延伸。

新质生产力的产业“业态”

发展新质生产力源于科技创新,落脚点是产业创新,即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由此产生新质生产力由“质态”向“业态”的转化。根据现代竞争理论,国家和地区竞争力表现为产业竞争力,产业竞争力的提升依赖于科技创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及时将科技创新成果应用到具体产业和产业链上,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布局建设未来产业,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

(下转3版)

重要言论

我国幅员辽阔,东西南北中资源禀赋差异明显。新征程上,各地区要按照党中央战略决策和规划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紧跟时代潮流、抢抓发展机遇,立足自身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因地制宜推动高质量发展。

长征是检验识别领导干部的试金石

□ 陈东恒

检验识别领导干部具有突出的方向性,必须坚持党管干部、组织选人

长征检验识别领导干部的历史,是党在极端困难条件下探索科学选人用人机制的生动实践。这场远征不仅是一次伟大的军事战略转移,也是对我军领导干部队伍的筛选。在这场大考中,我们党不仅依靠自我革命完成了自身建设的拨乱反正,也对干部政策进行强力纠偏,淘选出卓越的领袖和领导干部队伍。

长征前后一段时期,博古、李德不顾中国实际,照搬共产国际指示,推行错误的干部政策。干部任免听命于共产国际顾问,以个人独裁取代集体领导、以宗派主义打击排挤异己,排斥有实战经验的工农干部,对持不同意见的指挥员动辄撤职、批判,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和长征初期的严重损失与用人失察有很大关系。湘江战役后,党中央开始实现干部选用自主,高层任免、师团干部调配、火线提拔不再受制于共产国际,不再机械以书本理论、共产国际指令评判干部。从中央高层到师团基层,干部工作由党委、政治局集体讨论,充分听取一线指挥员、支部、士兵意见,重大复杂人事难题集体解决,规避个人片面判断造成失误。遵义会议解决了党内所面临的最迫切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

习主席强调,“我们是党管干部、组织选人”。长征不仅筛出了彻底的革命者和革命队伍,也筛出了党的正确思想路线、组织路线、军事路线,更为党和军队干部队伍建设构建了一套适合国情军情、经受历史考验、影响至今的根本制度。前进路上,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党管干部原则,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充分发挥党委领导和政治机关的作用,严格按原则、政策、规定、程序为党和人民选人用人,把忠诚、干净、担当的领导干部选好用好,确保枪杆子始终掌握在对党忠诚可靠的人手中。

检验识别领导干部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必须严把政治关

长征检验识别领导干部的历史,是对苦难探索中领导干部政治立场和路线认同的严峻考验。这场远征不仅是物理上战天斗地、生理上挑战极限,也是对理想信念和政治信仰的筛选。信仰不坚定者、意志薄弱者、怕苦怕死者淘汰出局,革命理想主义者、革命英雄主义者、革命乐观主义者最终留下。

长征时期艰苦卓绝的斗争实践是最硬核、最公正的考核标尺。所有识别标准紧扣革命生存核心目标,立足生死斗争的具象化落地,精准区分合格干部、投机干部、错误干部。毛泽东说:“我们的军事力量在长征前曾经达到过三十万人,因为犯错误,后来剩下不到三万人,不到十分之一。重要的是在困难的时候不要动摇。三万人比三十万人哪个更强大?因为得到了教训,不到三万人的队伍,要比三十万人更强大。”长征在艰苦的考验中,筛除了因信仰动摇开小差、逃亡甚至叛变者。它深刻表明,识别干部必须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把那些在重大考验和历史转折点对党忠诚、立场坚定的领导干部选出来任用好。

(下转2版)

权力不能脱离监督

——“窑洞对”的启示

□ 本报评论员 吴 青



抗战后期,在中国命运的大转折关头,中国共产党主张成立联合政府、深得人心,国民党却坚持独裁、日渐腐化。1945年7月,黄炎培等人赴延安考察,亲眼看到边区上下一致、积极向上的景象。其间,毛泽东邀请黄炎培在窑洞长谈。黄炎培针对掌权者精神松懈、惰性发作、强求发展的历史现象发问:“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作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就是党史上著名的“窑洞对”。

80余年斗转星移,“窑洞对”揭示的表象并未因时代变迁而消失。随着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管党治党的对象、环境、问题都已不同以往。“窑洞对”的要义,是回答如何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避免人亡政息、确保政权长期存在的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窑洞里给出了第一个答案,这就是‘让人民来监督政府’;经过百年奋斗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的实践,党又给出了第二个答案,这就是自我革命”。这一重要论述,把延安窑洞的历史之问与新时代赶考路上的时代之答贯通起来。自我革命是强身健体的“内在免疫”,接受人民监督是祛病除病的“外在良方”,二者同向发力,都要融入日常、抓在经常,管好关键人、管到关键处、管住关键事、管在关键时,推动监督常态化、长效化。

依靠人民监督权力。黄炎培之问,表面问的是政权兴亡,实质问的是权力与人民的关系。毛泽东之答正是对这一关系的深刻自觉:权力来自人民、执政为了人民、兴衰最终由人民评判。人民是最强大的监督力量,依靠这种力量,不良风气“潜伏”再深也无所遁形。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人民群众中蕴藏着治国理政、管党治党的智慧和力量,从严治党必须依靠人民。”让权力在监督中避免“任性”,要激发人民群众主人翁意识和监督热情,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监

督意识,提高监督积极性和监督能力,为监督工作的良好开展创造有利条件,推动形成人人要监督、人人愿监督、人人敢监督的良好氛围。同时,让群众在监督中感到受尊重、被信任、有底气。健全落实监督保障制度,加强对监督者的保护,对监督有功的给予奖励,对监督保障不力的依法依规追究责任,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监督的积极性、主动性。

自觉接受人民监督。人民监督发现的问题,是自我革命的靶向;自我革命的成效,要接受人民监督的检验。践行历史周期率的两个答案,难在贯通,也成在贯通。贯通的关键,在于把外在约束转化为内在自觉。监督要长效,最终要靠自觉。领导干部要听得进逆耳之言、容得下真诚批评,对监督中暴露的问题,不遮掩、不推诿,主动认领、刀刃向内。不断提高制度执行力,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把制度执行的过程变为接受监督的过程,使监督变为长久之治。抓住“关键少数”以上率下,领导干部要习惯在受监督和约束的环境中工作生活,真正把纪律规矩转化为日常自觉。

始终畅通监督渠道。人民监督要落地见效,离不开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的渠道保障。坚持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推进权力运行公开化、规范化,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形成发现和改正失误和错误的机制,使人民的民主监督权利得到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落实。将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各个环节贯通起来,通过人大监督、政协民主监督、舆论监督等渠道,保障人民在日常政治生活中的持续参与权利,让人民群众的意愿意见有入口、有办理、有回应、有保障。

从杨家岭窑洞到新时代赶考路,“窑洞对”穿越时空,留下的课题常读常新。新征程上,我们党必须激发监督动力、自觉接受人民监督、畅通监督渠道,把人民监督的外在约束与自我革命的内在自觉统一起来贯通起来,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不断开辟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